

名家散文典藏

韩少功<sup>印</sup>  
散文

HANSHAOGONG SANWEN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少功散文 / 韩少功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1

(名家散文典藏)

ISBN 978-7-5339-2822-3

I. 韩...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6533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一 如

责任出版 朱毅平

## 韩少功散文

韩少功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04千字

插页 3

印张 13.75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822-3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韩少功** 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2），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现居海南。

主要文学作品有《韩少功系列作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长篇随笔《暗示》，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1981）、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1997）、全国鲁迅文学奖（2007）、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7），以及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2002）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被推选为“20世纪华文百部文学经典”之一。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 目录

### 第一辑 远方

你好,加藤 / 003  
岁末恒河 / 016  
草原长调 / 025  
笛鸣香港 / 033  
万泉河雨季 / 040  
人在江湖 / 051  
世界 / 059

### 第二辑 流痕

我家养鸡 / 075  
戈壁听沙 / 078  
那年的高墙 / 082  
走亲戚 / 087  
漫长的假期 / 096  
记忆的价值 / 116  
收水费 / 118  
阳台上的遗憾 / 124

4月29日 / 127  
能不忆边关 / 129  
八景忆雪 / 141  
母语纪事 / 144  
我与《天涯》 / 147

### 第三辑 背影

然后 / 171  
美国佬彼尔 / 175  
重逢 / 182  
陆苏州 / 190  
那一夜遥不可及 / 192  
光荣的孤独者 / 195  
最后的握手 / 200  
聂子其人 / 202  
月下桨声 / 205  
空院残月 / 210  
母亲的看 / 215

第一辑

# 远方

# 你好,加藤

## 一

加藤四岁的时候就到了北京,进了一所幼儿园,是班上唯一的日本孩子。他与同学们一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小兵张嘎》。孩子们玩战斗游戏的时候,他的日本身份似乎使他最适合扮装日本鬼子,但他决不接受这种可耻的角色,吵闹着一定要当地下武工队员,当八路军的政委。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很有趣:八路军里怎么冒出一个日本政委?母亲遇到了幼儿园的阿姨,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要强,老师,拜托了,你就给同学们做做工作,让他当上八路军政委吧。

其实,日本母亲用不着拜托中国阿姨。小伙伴们都喜欢加藤,一再把战斗的指挥权优先交给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正式建交之前来到中国的。当时居住北京的外国人很少,也少有专门招收外国小孩的幼儿园。但加藤的父母很乐意让小孩与中国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假日里来加藤家做客,顺便给加藤带来一点礼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没料到八路军小政委在家里也坚守抗日阵地,一见太阳旗便怒从心头起,将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跺了两脚。

瑞典朋友大惊失色,不知道一个日本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释了孩子的幼儿园和孩子看过的电影,客人才惊魂稍定地坐下来,理解了一个孩子反常的粗野和激愤,理解了一面日本国

旗在当时纯正北京腔里的含义。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抗日动员,是一首战争年代里燃烧着悲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 二

现在,加藤即将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开着德国汽车出没于东京的车水马龙之中。他不会再那样粗暴地对待日本国旗了,不会再那样简单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继续学习中文,专业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希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种愿望也许是他父母的心理遗传,甚至是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人生经历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像他的几位青年朋友一样,离开那个显得较为狭小的九州岛,来到新大陆传播知识和技术,也希望在这里寻找和建设自己的理想。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日本政权高层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国东北乃至华北丰饶的矿产、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为了争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抗拒西洋大国的挤压,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展——这成为了那个时代启蒙维新逻辑的自然结论,不会让任何新派人士惊诧。民主几乎与殖民两位一体。“大东亚主义”等说辞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在日本报纸上的。日本议会民主运动主将和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同时成为了当时挟“二十一条”以强取中国山东的著名辩家。人们在诸多说辞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利益指向,却基本上共享着一种踌躇满志的向外远眺和帝国理想。

理想主义青年自发的援外扶贫,最终被纳入了官方的体制化安排,纳入了日本军部对伪满洲国的政治策划。加藤的母亲后来说,加藤的外祖父当时受蒙蔽了,终于同意出任伪满洲国的公职,成了一名副县长,位居中国人出任的傀儡县长之下,却是实际上的县长。他忙碌于繁杂政务废寝忘食,真心以为东亚共荣能在他的治下成为现实。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而且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后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入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细细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唆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式红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的执政者。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以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的亲属。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丈夫应得的勋章。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她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超越大海，能够对“国家”和“民族”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敏感的戒意。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三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一切乘客脱下身上的衣服，劈头盖脑给他们一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来国外的肮脏和病菌。她护住三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冷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呛人的药粉迎面扑来之际，她心目中的故国反而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日本天皇的授勋，而且让女儿从师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上中断了的故事。

### 三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



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但日本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组团到中国去访问,毛泽东的著作和周恩来的画像在日本的书店和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很多日本热血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美国驻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各个社会领域意气风发,往日最为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了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到了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为人民服务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广阔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能够让他们兴奋不已。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上介绍,引起了日本读者一片惊讶和轰动。中国政府放弃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入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备觉温暖。

在当时的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新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会结构大变革。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不难理解,当庆祝“四人帮”下台的锣鼓鞭炮在北京爆响,当中国革命中的诸多罪恶和人权灾难随后在媒体上曝光,海峡那边很多日本友人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更多一些绝望和迷茫。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再一次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曾经把日本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去求取启蒙和维新的救国之道,后来却被日本的大炮隆隆迎头痛击,那么现在,众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曾经把中国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来寻找独立和革命的救国之道,最终却被中国突然亮出来的累累伤痕吓得浑身冰凉。

历史再一次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开了个玩笑:继中国误解“先进”的日

本以后,日本也误解了“先进”的中国。一个维新梦,一个革命梦,先后在很多人那里一一破灭。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不得不开始重新相互认识的漫长过程。

误解难以避免。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同于英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巴或者希土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为一度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其交往动机中更暗伏着一种发展道路及其社会制度的寻优和竞比,意识形态的制幻剂常常带来更多一相情愿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灭,意识形态的放大器也就会大大膨胀怨恨或者轻蔑,加剧两国关系的震荡。从“停滞落后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语)到“一无是处的日本”(竹内好语),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可以更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先进”模式的光环下穷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维新。但这种取代,只是使“先进一落后”的视轴来了一个上下倒置,源自欧洲的单元直线历史观却一如既往,一心追赶先进文明的亚洲式焦虑和亚洲式迫切一如既往。

向西方工业化看齐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亚洲人免不了有点慌不择路,也就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热以及随之而来的骤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亲向我讲述他们在北京目睹江青被捕时的中国,目睹北京市民和学生连夜庆祝游行时眼中激动的泪水,他们当时的感受十分复杂。他们既无意拥护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对江青的崇拜和声援,也无法认同一些右派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幸灾乐祸,还有对中国文化的顺手诛杀。他们几乎再一次听到了当年中日战争爆发的炮声,颇有些一时的手足无措。

中国革命的这次重挫和转向,不能不启动思想和情感上的地壳运动,中日之间再一次山重水复。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就可以看得明白,“进步一落后”的标尺在本世纪两度失效之后仍然没有废弃,而且在东欧和苏联崩溃之后更增神威,正在迅速比量出各种冷漠和歧视的最新根据。很多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论和很多中国人的“殖民不够”论重新获得了活力。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战争问题向韩国正式道歉而至今不向中国正式道歉,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国内舆论主流暧昧的纵容,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赤色支那无权受此大礼。

有意思的是,被轻蔑者有时也能熟练运用轻蔑的逻辑。很多中国人此时虽无制度的优越感,虽处“十年动乱”后的贫困,但即使在全中国风行和泛滥着丰田汽车、索尼电视、本田摩托、尼康相机、富士胶卷、东芝电脑以及卡拉OK的时候,即便是那些热烈向往资本主义的新派精英,对“小日本”的轻蔑也暗中储备,常常一触即发,与他们对欧美的全心爱慕大有区别。他们崇美而贬日,厚西洋而薄东洋,能忍美国之强霸却难容日本之错失。他们似有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的直觉,其中不便明言的潜台词更是微妙而且耐人寻味。他们不过是流露出一种日本人同样熟悉的区别法则,不过是觉得自家邻居的黄皮肤和黑头发不足为奇,也不足为尊,无法代表最先进的文明和最先进的人种,因此必须扣分降级。“小日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日本人炫目的现代化虽然让人眼红,但仍不足以改变“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牛皮哄哄?

这样,自以为已经“脱亚入欧”的很多日本人觉得无须再高看中国,而渴求“全盘西化”的很多中国人从另一个层面上把轻蔑目光奉还给日本,不能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就像他们不能接受某个同村老乡突然抢先得到了城市户口和高级职称。歧视“落后”的飞去来器伤人最终伤己。两个文化相近经济相依的邻国,两个地理上仅仅一水相隔的邻国,反而面临着越来越遥远的心理距离。

加藤的父母无法改变历史,他们复杂的感受看来只能深埋内心而被人遗忘。他们拥抱中国的努力,包括他们翻译的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品,还有对中国技工赴日培训等各项友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无法不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讥嘲。这些傻书生,他们当时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现代化的富足繁荣吗?他们当时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条条大路有“丰田”吗?他们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跑到中国来瞎折腾?

何况他们对于中国似乎无恩可报,倒是有伤难愈。加藤母亲的童年是在中国监狱里开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国被处决的。中国东北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罪案卷宗,其中指控他聚敛民财和三妻六妾之类均属不实之辞。这些历史旧账是不可能得到重审甄别的——档案馆的中国官员这样冷冷地告诉他们。

哈尔滨,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从今以后是不会再去那个

地方的。那么中国呢,外祖父没有写完的故事在这里再一次面临今后的无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点行装,是不是应该再一次告别这片广阔的大陆?

## 四

我没有见过面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在日机轰炸下的难民人流里。我岳父的堂兄也是在日军的湖南南县大屠杀时饮弹身亡,尸骨无存。这使我在东京成田机场听到日本话和看到日本国旗时心绪复杂。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国度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由于汉文化的农历新年已经退出日本国民习俗,更得不到日本法律的承认,西历亦即公历的新年便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节日。政府、公司以及学校都放了一周左右的长假,人们纷纷归家与亲人团聚。街上到处都挂起了红色或白色的灯笼,还有各种有关“初诣(新年)”的贺词或敬语。但一个中国人也许会感触到隆重喜庆之中的几分清寂,比如这里的新年没有中国那种喧闹而多一些安静,没有中国那种奢华而多一些俭约,连国家电视台里的新年晚会也没有中国那种常见的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花团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寻常的年度歌赛。如果说中国的除夕之夜像一桌豪华大宴,那么此地的除夕之夜则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适合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地静静品尝。

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献上了我的一束鲜花,意在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们无言的感激。我知道我们之间横亘着将近一个世纪的纷乱历史,纷乱得实在让人无法言说唯有长叹,但人们毕竟可以用一束鲜花,用一瞬间会意的对视,重新开始相互的理解。

让我们重新开始。

加藤的母亲请我吃年糕,是按照加藤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萝卜和红萝卜都切成了花。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种米粬煮萝卜的年夜饭别具一格,堪称素雅甚至简朴。其实日本传统的饮食虽有精致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蕴。生鱼、大酱汤、米饭团子,即使再加上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传来的油炸什锦(天福罗),也依然形不成什么菜系,不足以满足富豪们的饕

饕味觉。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国菜和法国菜那样风行世界的原因。

同样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服饰也相当简朴。在博物馆的图片资料里,女人们足下的木屐,不过是两横一竖的三块木板,还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们身上的裤子,常常就是相扑选手们挂着的那两条布带,也缺乏裤子的成熟形态。被称做和服或者吴服的长袍当然是服饰经典,但在18世纪的设计师们将其改造之前,这种长袍既无衣扣也无祥带,只能靠腰带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临时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传统的家居陈设仍然简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家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龙凤雕床比肩。也许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传统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习惯于四壁之内的空空如也。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墨重彩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正是在这一个个暴露出历史荒芜的遗址面前,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了轰动媒体的奇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的过去于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

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但日本在 20 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现代经济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去,倒会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但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如此严刑峻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常常花点钱去学点什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和白眼——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日本人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地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士农工商”,日本的“士”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统为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吸收“汉才”以及“(荷)兰学”,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在“和平宪法”下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武士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穷,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 70 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

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却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职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轻术，这些中国儒生的饱暖之议在日本语境中影响甚微。基于生存的实用需要，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是广受尊重的阶层，在江户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坚实基础。行规严密，品牌稳定，师承有序，职责分明，立德敬业，学深艺精，使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甚至一直延伸为日本在6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直到今天，日本企业的终身制和家族氛围，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还有日本座座高楼中员工们下班后习惯性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日本不一定能够被人认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国或者文化大国，但它完全具有成为技术强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造出比法国埃菲尔铁塔更高的铁塔，造出比美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造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干线、机器人、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无足称奇。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不如说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根，并且发生了变异性的开花结果。

有趣的比较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这样，种子在土地里发芽而不能在石块上发芽，在不同的土壤里也不可能得到同样的收成。人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制度崇拜，人们关于左转姓“社”还是右转姓“资”的简单化纠缠，常常都遮蔽了一个民族在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后面更多重要的因缘。

整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徘徊萧条中度过，让很多中国也困惑

生疑。我在日本访问期间问过很多日本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一脸脸的茫然，没有听到特别详细和明确的回答。也许是以前投资过热了，也许是美国不再忍受贸易赤字了，也许是日本没有赶上新经济这一趟车，也许是金融和行政改革不力，也许外务省和大银行能知道个中原委吧，也许……我相信这些“也许”都有道理，能给我思考的启发。但我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日本的武士传统和职人传统在百年之间已经能量耗尽？或者说，是不是这两大传统已经不再够用？

情况已经在变化。科学正在被自己孕育出来的物质主义所畸变，民主正在被自己催养出来的个人主义所腐蚀，市场正在被自己呼唤出来的消费主义巨魔所动摇和残害。情况还在继续变化。绿色食品的原始和电子网络的锐进并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如麻。进入一个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社会都在深刻变化和重组的新世纪，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动力？

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点从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职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点想象和玄思？

还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进”文明的狂跑中冷静片刻，重新确定一下自己真正应该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标？

## 五

加藤说，东京各路地铁每天早上万头攒动，很多车站不得不雇一些短工大汉把乘客往车门里硬塞，使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对鼻子地几乎都压成了人干。但无论怎样挤，密密的人海居然可以一声不响，静得连绣花针落地好像都能听见，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经济十字军。这就是日本。

我说，中国各个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戏的，跳国标舞的，打太极拳的，下棋打牌的，无所不有。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均无商业化收费，更不产生什么GDP，但让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络，心安体泰，鹤发童颜。当年繁华金陵或者火热长安里市民们的尽兴逍遥想必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中国。



加藤说,很多日本人自我压抑,妻子不敢冒犯丈夫,学生不敢顶撞老师,下属更不敢违抗上司,委屈和烦恼只能自己一个人吞咽。因此日本的男人爱喝酒,有时下班后要坐几个酒店喝几种酒,喝得领带倒挂、眼斜嘴歪、胡言乱语,完全是一种不可少的发泄。提供更多疏解郁闷的商业服务也就出现了,你出钱就可以去砸东西,出钱就可以去骂人,客人一定可以在那里购得短时的尊严和痛快。这就是日本。

我说,很多中国人圆滑处世,包括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伪军数量之多和易帜之快一定创世界之最。这些伪军中当然有附强欺弱的人渣,但也有相当部分是所谓脆卵避石,屈辱降敌并不妨碍他们后来明从暗拒阳奉阴违,甚至给皇军使阴招下绊子,私通八路见机举义。这些人可说是见风使舵投机自保,也可谓之为借力用力以柔克刚。他们毫无原则但也不拘泥教条,当不成烈士却也不一定全无心肝,常常在多种人格之间随机变幻直到最后投靠安全的真理。这也是中国。

加藤还说了很多。他说到加藤家父辈是德川幕府的重臣因而是明治维新中的反动派,说到东京禁用廉价汽油,名为加强环保,实则是欺侮穷人,还说到东大学生发明了一种软件可以把任何文章都转换成校长大人可笑的文体……说得我哈哈大笑。但他和我都知道,无论我们怎样说下去,我们也无法把中国或者日本说清楚。何况我们说的中国甚至很可能也是日本的隐面,我们说的日本也可能就是中国的隐面——语言总是很容易引人陷入思想泥沼。

加藤还是操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他带我去参观东京都博物馆。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群日本少男少女,像中国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中也有好些人把头发染成了黄色,以此宣示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离经叛道的美学,更宣示着他们对欧美文明的向往。这种向往当然也合乎常理。有意思的是,这些化学造就的黄头发,走到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区时,突然看到了美军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东京都等日本城市的轰炸。这里没有解说员,简略的几张图片下也没有详尽的说明文字,博物馆似乎对那一段历史既无法回避,又须尽量保持沉默,至少也要对当年十几个城市的遍地废墟闪烁其词——美国毕竟是当今日本最重要的盟国。但馆内的扬声器里持续不断地传出当年的实况录音,有警报器的尖啸,有战机的俯冲和